

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 For Economists

总第十二辑

◆ 党国英
◆ 陈抗
◆ 张曙光
◆ 叶航
◆ 赵凌云
◆ 欧阳红兵
◆ 赵人伟
◆ 管晓云
◆ 刘建兴
◆ 李海舰
◆ 王则柯
◆ 蔡昉
◆ 梁小民
◆ 聂辉华
◆ 朱荫贵



农村观察散记(二)
掉地上的钞票为什么没人捡?
给企业家著书立说热降降温
两小时掌握现代经济学的精髓
中国经济学思潮: 各领风骚三五年
在香港学习金融学
“文革”期间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中国之行
国外常青藤大学经济系龙虎榜之排法
从单位人到社会人
别人的信封似乎更诱人
经济学规律的善用与滥用
谈武论侠话经济
杨小凯: 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
近代中国银行界的海归派

2003 · 2

3

山东人民出版社

“茶客”风采



李海舰，1963年生于山东。1990~1991年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高级访问学者，1992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产业转移、利用外资、跨国公司和战略管理，形成了新开放观、新安全观、新企业观、新战略观、新财富观、“三大法则”、“三个代表”等重要思想。

我是一个以“玩字”为生涯的人。一是“写字”。一开始时，“写字”纯粹为了生计需要；后来，又把“写字”当作一种自我价值实现。二是“说字”，即民间所讲的“卖唱”。时常，会“写字”的人不一定会“说字”。长期以来，各领域的“话语权”之争，通俗地讲就是“说字”之争。三是“改字”。作为编者，一头连接作者，一头连接读者，我把他们称作“两个上帝”。一切为了“两个上帝”，这是我“改字”的一贯规则。四是“造字”。所谓“造字”，就是创造新的理论范式，在宏观上“领航”社会与时俱进、与世俱进，在微观上“点拨”企业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围绕着“字”，经济学家是一个指导人们如何把“字”变成财富的人，而《经济学家茶座》则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揭示了把“字”变成财富的奥秘。

—— 李海舰



财劫 (黎青)



猫和老鼠的游戏

●卢周来

一位读者在读了《茶座》第11辑上发表的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之后发来一封电邮,说最近也看到了一则同样是调侃经济学家的幽默:经济史学家就如同在漆黑的屋子里追一只老鼠的猫;经济学家就如同在一间没有老鼠的屋子里说一定要追到老鼠的猫;而计量经济学家是在一间本来没有老鼠的屋子里追老鼠却声称自己已经抓到了老鼠的猫。

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学在这则幽默中成了猫抓老鼠的游戏。

即便真是猫抓老鼠的游戏,也不是没有价值。近数百年的经济学家市场供求关系一直很稳定,证明这种游戏真有其功能。一者,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学科,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需要有经济学家用“猫眼”来解释世界。二来,偶尔经济学家的建议不定还真是“瞎猫逮着了死老鼠”,也足以使主人的财富增加若干,历史上不是有这样的例子。三者,即便真逮不着老鼠,猫的叫唤也可以让老鼠不敢出来。马克思大概算得上一位西方世界的大猫,让资本世界的某些“邪恶老鼠”害怕。退一万步讲,以上功能都没有,就算纯粹是个游戏,也可以娱乐社会。迪斯尼有一个著名的卡通片《猫和老鼠》,吸引了三代小朋友的眼球至今不衰;

张柏芝主演的《老鼠爱上猫》票房收入也

、张柏芝主演的《老鼠爱上猫》票房收入也

而且,说经济学的身份。往往是人们把一件事做到随心所欲的地步,才能达到“游戏”的境界。所以,中国圣人孔子说过,士“志于道”,但却是通过“游于艺”来“弘道”。古希腊与罗马的哲人也将诡辩作为到达真理之境的游戏来做。而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经济学家希克斯更是坦言:“经济学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智力游戏。”

所以,不妨让我们翻开《茶座》,看看各位“高猫”是如何继续在玩“抓老鼠”的游戏吧!



经济学家茶座

(第 12 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顾海良
梁小民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 明 善

副主编

刘 德 久

执行主编

詹 小 洪

责任编辑

董 新 兴

陈 丹 丹

卢周来 猫和老鼠的游戏/1

【国是我见】

党国英 农村观察散记(一)/4
陈 抗 掉地上的钞票为什么没人
捡?——兼谈“反公地悲
剧”/9

杨瑞龙 进入国际化的快车道/15
辛向阳 韦伯的印章与信用的
中国/18

【学问聊斋】

张曙光 给企业家著书立说热
降降温/24

姚 洋 苦心翻译为哪般/28
叶 航 两小时掌握现代经济学的
精髓/31

赵凌云 中国经济学思潮:各领风
骚三五年/37

欧阳红兵 在香港学习金融学/46

【学界万象】

赵人伟 “文革”期间美国经济学家
代表团中国之行/51

管晓云 国外常青藤大学经济系
龙虎榜之排法/56

刘建兴 经济研究的个体性与
群体性/67

李海舰 从单位人到社会人/72
张宇燕 经济学(家)笑话集锦(下)/76

【生活中的经济学】

王则柯 别人的信封似乎更诱人/83

王跃生 保姆的经济学/88

赵 泉 我被康柏卡住了脖子!/92

杨 强 农家缘何好“做事”/95



【评论与随笔】

- 蔡 昉 经济学规律的善用
与滥用/100
- 李文海 医生、木匠与托儿/104
- 熊秉元 一以贯之的道/108
- 梁小民 谈武论侠话经济/111
- 朱铁臻 一个没有小偷的城市——
访韩国济州市/120
- 张宏志 当公平与效率打平手
时/123
- 何 伟 一个经济学者眼中的
《龙年档案》/127
- 金 碚 报业经济学探索/131

【学者访谈】

- 柳 红 滴水见日——访问梁小
民/136

【经济学人】

- 聂辉华 杨小凯：华人经济学界
的“骄杨”/144

【经济史话】

- 朱荫贵 近代中国银行界的海归
派/151

【编读往来】

- 罗子俊 杂谈？狂想？妄语？——
读《茶座》前十辑有感/1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第12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4

ISBN 7-209-03234-7

I.经… II.金… III.经济学
-文集 IV.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第030461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0531)2060055-4901

E-mail:chazuo@eyou.com

发行部电话(0531)2060055-4903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2003年4月第1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1/32开

5印张 13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10.00元



农村观察散记(一)

●党国英*

中国农村是一个多彩的世界，也是一个令人心痛的世界。这几年常到农村走走，也交了两三位农民朋友，有了过去不曾有的感受，很想写下来给朋友们看看。我知道经济学界的朋友们有高雅的兴致，喜欢一些经济学界的掌故和趣闻逸事，但西湖龙井喝多了，偶尔来一点乡野粗茶也有助消化功能。但愿《经济学家茶座》的“茶客”不会因为我提出农村话题而扫了兴致。

万言书

中国农民也许是世界上最关心政治的农民。我曾听说，中国的最高领导差不多天天能收到“万言书”，我相信其中有许多是农民写的。“万言书”大概多是议论时政的。书送到了最高领导那里，不难想象，那又多是议论全国政治的。我每年都能收到农民朋友的一些信，其中有关于农村改

革的议论，也有关于全国改革的议论，有的信写得很长。

阅读农民朋友的信，首先一个感受，是他们的文字水平大多不错。当然这些信不会有华丽的辞藻，但议论风生，文理通顺，还是颇有可读性的。记得有一位四川的农民写给我几封信，水平的确不错。后来，他被法院判了8年有期徒刑。他在监狱里还给我写信，想以后当一个作家，我回信说，这个路恐怕难走，当作家能养家糊口的只是少数啊。后来我知道，他所在的乡里，农民和政府发生了冲突，一些农民围了乡政府，一名警官在突围时受伤并不治身亡，他被指控负有责任。我估计，他刑满释放以后，还会用自己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政见。

农民的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希望有一种最高的普照之光来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他们的议政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作品大都会说什么样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政府行为来解决,其中还特别相信教育和思想工作能有扭转乾坤的作用。他们往往不大相信农民自己能解决问题。

我发现湖北的农民对国家事务关心程度更高一些。李昌平出在湖北,也许对那里的农民有影响。我与湖北农民邹传舜有长期的通信往来,他写了大量的东西谈家乡的事情。前不久他又来信说,家乡遭了“六合彩”的洗劫,他自己也不能幸免,让我感到难过。一个有见识的农民居然也能上这样的当,叫人难以理解。还有一个湖北农民,写了一篇很长的东西,谈农村改革,再三要我把它送给学者,送给决策者。他的改革建议有:县级机构改革,保留30名工作人员;乡级再保留10名工作人员;实行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发行专项债券用于支援农业,并由政府担保等。他还说,要把北京新华门边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改为“与时俱进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的感受是,农民不大信任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认为他们不了解农村,他们提出的办法不灵。

农民关心政治,是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反映。如果什么时候多

数农民只关心自己的发财致富,中国农村也许才算得上正常。政治是少数人的事情才好。

民主的前奏

这几年,还真有少数农民在农村政治活动中搞得有声有色。湖北潜江市的姚立法当了市人大代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赢得了一方百姓的尊敬和信赖,他现在已经是声名远播了。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东部某县的一个镇。有个农民叫崔祥联,本来是个当地政府封过的“农村科技个体户”,近几年为村主任这个职位,已经变得一贫如洗了。他竞选成功了,但和村支部书记搞不到一起,书记要把他拿下,自己出面竞选村主任,但没有成功。老崔抓住了书记的什么把柄。乡里支持的是书记,书记腰杆子便硬了。我去年到那里走了一趟,感受到了气氛的紧张。就当我在村里的时候,一位农民被一些人打得头破血流,据说是书记的什么亲戚干的,因为这位农民在选举投票中没有给书记投票。我给这位农民拍了照片。老崔告诉我,这样的事情已经不稀罕了,他自己也挨几次揍了。老





崔真不容易,他的房屋摇摇欲坠,借别人的房子住,连元配夫人也忍不了贫穷离他而去。老崔有一番改变村里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但有人跟他捣蛋,他干不成。老崔还联系让我见了好几位民选村主任,他们的日子都不好过。

老崔这个人的活动给我很大启示,就是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所谓百姓的素质没有什么关系。关键是要有一个政治家公平竞争的环境,政治家要职业化。老崔很懂法律,为学习法律,他订阅了不少报刊,也花了不少钱。他敢斗,又能依法斗,农民心里有一杆秤,就给他投票。这就够了。没有必要让农民懂多少法律。现在的选举结果常常不能使农民满意,原因是选举没有按程序进行,有人便说农民不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实在是愚蠢。其实,只要有政治家懂得用法律捍卫自己公平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利就够了。只要政治家在互相竞争中眼睛盯着对方,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威来瞎搅和,民主政治就大抵可以出现。如果不是对政治经济科学一知半解,就应该懂得,要让每个农民都懂法,那会付出多大的成本。

在厦门市做调查时,有的地

方干部说,农村民主选举要亡党亡国,理由呢,是说农村选举中打架斗殴,还选出了地痞流氓。我的朋友、社会学家王春光对这种说法很不以为然,按他的说法,只要真正是选举出来的,总比靠拍脑门子任命的好。我赞成这种看法。很多国家和地区在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都有政治家打架的事情发生。规则常常是打出来的。怕小打,就会出大打,这也许是历史的经验。民主政治的前奏有很多表现,打架是其中之一。

像老崔这样的农民有相当一些,各地都有。他们经受挫折是不奇怪的。目前的政治安排还没有真正创造出农民参与政治的宽松环境。但是,这样的环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农民争来的,在这个争的过程中,有的农民必然遭受牺牲。

大平原上的封闭

什么是地理上的平原概念?想必现代中国人都以为那就是一望无际的平整的田野。我慢慢发现这似乎是一种无知。自然形成的冲积平原并不是真正的平地,而是低岗、小丘连绵不断的地貌。

涉猎一点华北平原的历史资





料,证实了上述想法。在古时河北某地,黄河穿境而过,现存有古代堤防遗迹,民间还有大禹治水的传说。古代那里有低岗,名为×山。春秋战国时期,赵王过陶山置馆舍,产生了西汉时代“馆陶”这个县域名称。后来,由于农民的垦殖,发展灌溉事业,削高填低,地貌就发生了变化,平原便形成了,以至于古代人士对类似于“×山”这样的名称百思不得其解。

到美国依阿华州,似乎可以看出“平原”的前身。那里地貌大体平坦,但由于没有多少灌溉,还是呈现一副低岗连绵的样子。如果那里也有很早的人类垦殖活动,还搞农田基本建设这类活动,想必也和中国的华北平原一个样子了。那里的农民是幸运的,因地多人少,可以粗放耕作,节约了灌溉成本,保护了环境,农业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华北平原上的农民并没有过上幸福的日子。历史上,这里水旱灾害频仍,特别是古黄河以及卫河、漳河交替决口泛滥,使当地百姓为水患旱魃所困。战争也常常洗劫平原的百姓,几乎一切改朝换代的战争都对这里发生影响。看得出,历经灾难磨砺,这里的人民给人以安贫守业、性情内

敛、对外部世界漠然以待的印象。

说实话,在第一次接触华北农村时我吃了一惊。农民的贫穷生活和乖顺性情给我以深刻印象。我的参照是我的家乡陕北农村。陕北农民固然贫穷,但常有豪放的性情,能产生出“信天游”那样的民歌。平原上农业效率高,交通也相对发达,农民的收益应该更好,生活水平应该更高,但事实好像不是这样。在过去,权贵们对农民的压榨以农民的最大忍耐限度为底线,以往有国内外的几位社会学家对这种情况做过描述。现今的农民的日子比起“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要好了一些,农民甚至对现代化的手段悉数接受,但他们的绝对生活水平的确还很低。我怀疑现今农民的生活是否达到了古代“五口百亩之家”的水平!在我调查的村里,农民的税费负担人均达到180元以上,平均每亩地分摊负担130元以上,而湖南农民的负担人均不过几十元,可是这里的农民要比湖南的农民安分得多!我真不知道事情何以至此!

在我家乡的一些地方,10年前农民就不种植多少粮食作物,他们种植经济作物,卖了产品后换粮食





吃,但我访问的华北农民好像不是这样。在我到那里的时节,农民拆了塑料保温大棚,恢复大田耕作,因为农民发现政府告诉他们的新方法不能挣钱。我做了十来户农家的家计调查,发现差不多近半数的40岁以上的成年人没有去过市首府。要知道,这可是华北大平原啊,而市首府又近在咫尺!

也许华北平原上的农民更容易受控制,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垂直控制的社会。这两年,有一句话被人们挂在嘴上,叫做“皇权不下县”,可是这决不意味着皇权对农民是慈善的。如果皇权不对农民剥夺,是存在不下去的。“皇权不下县”是皇权对农民控制的有效方式,皇权在农村的代理人能够实现他们的要求。如果皇权腐败到连它在农村的代理人也活不下去的时候,皇权就要倒台了。华北平原就在天子脚下,时间长了,也就形成了一种低水平的制度均衡,农民在官吏的看守下变得安分守己。

呵呵,中国的农民啊!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造了山野,把山岗起伏的土地变成了可灌溉的平原,甚

至把梯田修到了高山上,可他们没有力量挣脱控制自己的枷锁!

华北平原就这样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一时要卸下这个包袱还真是不易。我观察,这里的农村社会,垂直控制的力度仍然很大。土地所有权方式是实现控制的方式之一,也是制度低水平均衡的表现。我的了解是,农民的大部分和干部的全部,都赞成平均分配土地,都反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项中央“政策”,其实呢,中央所坚持的土地所有权方式早已给自己的“政策”来了个釜底抽薪,最终也与农村的现实相安无事。

财政的运行,也成了控制的方式。“村提留”由乡里拿了,不给村里一分钱,“乡统筹”则由县里拿了,也给不了乡里。甚至连村支部书记的工资也由县里“统筹”了,书记们也拿不了。我按照比较制度的方法,给农村税费的征用成本算了一笔账,一个乡的税费成本额竟是税费征收额的1.578倍!

朋友们,“茶客”们,我行笔至此,心里异常沉重。你手里是一杯苦涩的山茶。





掉地上的钞票为什么没人捡？

——兼谈“反公地悲剧”——

●陈 抗*

美国经济学界多年前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

有一天，一位学富五车的经济学老教授和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助理教授一起外出吃午饭。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眼尖的年轻教授发现地上有张 100 美元的大面额钞票，便弯下腰准备把它捡起来。不料，那位老教授立刻出手拦住他说：“别捡了，这钞票是假的。”年轻教授不服气，问道：“你如何断定这钞票是假的？”老教授随口回答：“如果这 100 元的钞票是真的，早该被人捡走了。”

老教授的答案虽然书呆得可笑，但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答案。市场的高效率保证它时时出清，谈判桌上没有剩下的钱，人行道上也不可能有还未被捡走的钞票。在老教授看来，年轻教授是经济学修养不够才会伸手去捡那掉在地上的钞票。

掉地上的钞票之所以没人捡，当然还有捡不来、不让捡、捡了也白捡等其他原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种种浪费现象，其实就和钞票掉地上没人捡一样。我们的无奈等待，其实还是和“捡不来、不让捡、捡了也白捡”分不开。

奥尔森 1996 年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题为《大面额钞票掉在人行道上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的文章。他认为，能够在国家这一层次上解释贫富差别的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资源的秉赋不同，二是公共政策和体制不同。奥尔森在文章中重点排除前一种可能性。

* 作者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应用经济系教授。





首先,生产技术和知识的缺乏不是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购买技术、知识的成本并不高。例如,韩国从1973年到1979年仅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用于购买专利和技术使用权。即使将所有外来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利润也计算为技术、知识购买费,总数也不超过同期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量的1.5%。

其次,土地贫乏和人口过剩也不是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如果是,那么从穷国向富国的大规模移民就会明显地缩小两国间的收入差别。可是,虽然爱尔兰在1821年与1986年之间大量向外移民,其人口密度由高于英国下降到仅是英国的1/5,爱尔兰的人均收入在1986年仍然只有英国的5/8。同样,从中南美洲向美国的大量移民并没有缩小这两个地区的收入差别。分析人口密度也可以使我们看到人口过剩、土地贫乏不是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富国里人口密度高的有不少(比利时每平方公里322人,日本325人,荷兰357人,都比印度的233人来得高),穷国里人口密度低的也有不少(巴西16人,肯尼亚25人,扎伊尔13人)。阿根廷在上一世纪初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但后来人均收入不断下降,现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期间阿根廷的人口密度一直很低,每平方公里只有11个人。

第三,资金缺乏也不是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资本应该是从回报率低的国家向回报率高的国家流动。一般来说,富国的资金充裕,资本回报率比较低,而穷国资金贫乏,资本回报率比较高。因此,穷国可以在国际资金市场上向富国举债进行投资,借贷双方都因此受益。研究显示,如果一个印度工人具有和一个美国工人同样的生产力并且提供同样的劳动,那么印度的资本边际产出应该是美国的58倍。即使由5个印度工人来提供与1个美国工人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印度的资金回报率仍然数倍于美国。当今世上有多少投资家、多少跨国公司无时无刻地关注着赚钱的机会。印度和美国之间如此巨大的资本收益差别必定会吸引许许多多的投资者把资金带到印度去。如此一来,印度就不愁资金缺乏了。问题是,投资者并没有从富国蜂拥到资金贫乏的穷国去,国际资本流动更多的是在资金充裕的发达国家间进行。由此可见,资本边际收益的落差是掉地上捡不起来的钞票,有其他原因





使投资者在穷国中无法享受资本应得的高回报率。

最后,人力资源缺乏也不是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奥尔森将人力资源分成两种类型:一是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它包括个人拥有的生产技术、勤奋的劳动态度、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以及创业、冒险的企业家精神。这一类型的人力资源在给定的社会体制和公共政策下能够提高个人的市场收入。二是公共物品型人力资源,它包括公德心、诚信、对公共政策的贡献以及为了做贡献而学习的知识。有关公共政策的知识和为制定正确政策做出的努力是公共物品,是无法在市场上交易的。公共物品型的人力资源只能通过影响公共政策和体制间接地影响个人收入。奥尔森发现,从穷国向富国的移民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因为从移民身上我们能够分离两类人力资源的效果。新移民虽然带有两种类型的人力资源,但由于其人数少,一般不足以对接受移民国家的公共政策和体制产生影响,因此对其个人收入起影响的只是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研究发现,美国的新移民,无论移民前国家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5还是1/10,其收入是同等条件(同样年龄、性别、学历)美国人的55%。另外,根据美国198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海地移民的平均工资是西德移民的一半。但是,海地的人均收入却只有西德的1/10。可见移民前的低收入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些移民的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太低造成的。同样,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的差别不足以解释许多国家和地区之间个人收入和经济表现的差别。奥尔森应用排除法使我们看到,决定国家贫富的主要因素不是包括技术、知识、土地、资金和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禀赋,而是一个国家的体制和公共政策以及影响体制与政策质量的公共物品型人力资源。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有亿万元钞票掉在地上没人捡!要捡起这巨额钞票,必须靠千万人的分工、合作,必须有对私人产权的绝对保护以及对合同的公正实施。好的体制和政策能够保证对产权长期有效的保护,杜绝任何形式的掠夺,激励人们从事分工、合作的创新生产活动,特别是“产权密集型”的生产活动。“掉地上的钞票”之所以“捡不来”、“不让捡”或者“捡了也白捡”,关键是体制不行、政策不好。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钞票掉在人行道上没人捡的事确实也不少见。





莫斯科街道上前些年就出现过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沿街店铺大量空置;另一方面,街道旁涌现出许多金属做成的箱型销售摊。在高峰期的1993年,莫斯科街道上有1.7万只这样的金属箱子,一眼望去就像是置身于金属森林之中。为什么在莫斯科寒冬里沿街叫卖的商贩不搬到温暖的店铺里去?为什么沿街店铺的拥有者要放弃可观的租金收入?为什么掉在街边的钞票多年没人捡?密执根大学一位叫黑勒(Michael Heller)的年轻教授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于1998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反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的概念。

大家也许对“公地悲剧”的概念较为熟悉。“悲剧”的产生是由“公地”的产权特性所决定的。“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而且没有人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结果是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放牧的草原、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以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它们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黑勒的“反公地”正好有相反的产权特性。“反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也有许多拥有者,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资源,而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反公地”的产权特性是给资源的使用设置障碍,导致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造成浪费。就像在一间房子的大门上安装需要十几把钥匙同时使用才能开启的锁,这十几把钥匙又分别归十几个不同的人保管,而这些人又往往无法在同一时间到齐。显而易见,打开房门的机会非常小,房子的使用率非常低。黑勒发现,莫斯科的沿街店铺和这间房子十分相像,具有“反公地”的产权特性。

直到1995年,俄罗斯95%的商用房地产仍然由地方政府拥有。其中,莫斯科国有店铺的产权结构尤其复杂,存在下面四个问题。首先,每一种产权有多个拥有者。例如,6个政府机构共享出售权,5个机构有权得到售款;3个机构有权出租店铺,5个机构有权收取租金。第二,产权的非对称拥有。有权出售的不一定有权获得售款;有权出租的





不一定有权收取租金；有权决定用途的不一定有占用权。第三，拥有产权的政府机构和机构中掌握决策权及实际控制权的官僚利益不一致，产生“委托—代理人”问题。第四，占用者一般无权将店铺转租。支离破碎的产权结构就像是一篓螃蟹，你夹住我的后脚、我钳住你的前腿，谁也动弹不得。莫斯科的沿街店铺有许多拥有者，他们都拥有阻止他人“开门”的“钥匙”，但谁都无法自己“开锁进门”，正好符合“反公地”的定义。

很明显，“反公地”的产权不是虚置、不明晰的产权，而是支离破碎的产权。“公地悲剧”可以靠明确产权来解决，而“反公地悲剧”则需要以整合产权来化解。那么，私人企业家有能力运用市场的力量对产权进行整合吗？从莫斯科沿街店铺的产权结构可以看出，做小买卖的生意人要在众多政府机构的“迷宫”中找出所有关键人物进行谈判，向他们购买产权，并且确保交易合同能得到顺利实施，的确是一件极其困难、交易成本极高的事情。对比之下，在莫斯科街边摆个金属箱销售摊子反而容易得多。先给消防局、供电局、城市建筑管理局等单位的主管送礼，得到他们的批准后再买通审批营业执照的工商管理官员，贿赂税务官员，向黑手党交保护费，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当然，这些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位叫卡拉莫夫的摊主这样说：“摊子设起来以后你还要继续行贿，不然他们会把它封了。黑手党是最容易对付的。他们不会要价太高，要多少拿多少，不会多拿。最难的是行贿。你送钱得送对人，不然白送。”卡拉莫夫的做法是在政府办公室外连续呆几天，见到官员就送些糖果和小礼物，最后总会有好心人指点迷津，帮他找到目标对象。摆摊子有章可循，租店铺却无门可入。结果必然是金属箱子越摆越多，店铺仍然闲置街边，掉在莫斯科街道上的钞票还是捡不起来。

中国“反公地悲剧”的一个例子是福建省前副省长张遗记述的关于闽江河沙的故事（见张遗著《觉悟：一个计划经济者的反思》，香港社会理论出版社 1992 年版）。话说日本东京的水泥厂每年需进口淡水沙 300 万吨，而福建闽江上游的洪水每年给闽江口带来 700 万吨河沙，阻塞航道。把闽江河沙卖给东京水泥厂既能疏通航道又可以赚取外汇，





是捞起“掉进河里的钞票”的好事情。日本议会日中友好议员协会会长古井喜实 1979 年给邓小平写信,要求福建长期提供闽江口淡水河沙。邓小平批示支持,李先念也批示赞成。没想到闽江河沙是“反公地”,诸多的“产权所有者”都想得到掉进河里的钞票。外贸局认为河沙出口属于外贸,应该归外贸局经营。交通运输部门则认为挖沙与清理航道分不开,应该由他们经营。建筑材料局又说河沙属于建筑材料,国家分工属他们经营。还有集体所有制的闽江河沙队,说是历史上他们以挖沙谋生,国家不应与民争利。这些单位相互间不断扯皮,一拖 6 年,日本方面只好作罢。掉进河里的钞票最终还是没有捞起来。

对“反公地悲剧”问题,政府部门近来有较明确的认识。据报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军扩认为,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同一企业的所有权由不同的政府机构行使。例如,人事权和监督权掌握在企业工委和国企监事会手中,收益由财政部负责,薪酬则由劳动部审定。其结果是,每个机构都可以从某个侧面向企业发号施令,但谁都不对企业经营的整体结果负责,也不可能负责(《联合早报》2002 年 11 月 17 日)。意识到产权支离破碎的弊端,十六大提出了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以确保国企所有者责、权、利的统一。建立统一的所有权代表的确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它的目的是通过整合产权来解决“反公地悲剧”问题。

诚然,在交易费用很高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整合产权要比市场整合有效得多。应该注意的是,现有的产权所有者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而产权有偿转让的方案则会使问题复杂化。另外,“委托—代理人”问题也将继续存在于独立、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之中。

